

# 小型化还是核心化？

——新中国 70 年家庭结构变迁

汪建华

**摘要：**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的家庭结构总体趋于小型化，但在改革开放后，核心化趋势并没有进一步强化，传统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家庭结构变迁的动力不仅来源于城市化、工业化，也与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政治运动、生活条件、计划生育、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比家庭现代化理论和我国已有家庭结构变迁研究文献发现：小型化与核心化趋势在不同时期并不一致，土改和集体化时期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并未带来小型化，改革开放后小型化也未伴随进一步的核化；相关指标在 2015 年抽样调查数据中出现反弹，家庭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未线性演进。

**关键词：**家庭结构 变迁趋势 小型化 核心化 家庭现代化理论

作者汪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城乡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在集体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不断处于转型重塑之中，社会组织形态也在持续发生变化。而家庭作为社会组织最基本的单元，其巨变也体现在家庭结构、代际关系、生育、婚配、养老等方方面面。

家庭结构是家庭研究中最重要领域之一，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结构变迁的研究也非常丰富。相关研究或基于国家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sup>①</sup>或基于研究机构、大学组织的调查数据<sup>②</sup>

① 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王跃生：《当代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比较》，《社会》2006 年第 3 期；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2 期；杨菊华、何绍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人口研究》2014 年第 2 期；胡湛、彭希哲：《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14 年第 3 期。

② 最典型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织的相关研究项目，包括：1980—1981 年“七地区调查”、1983 年“五城市家庭调查”、1993 年“七城市家庭调查”、1998 年“现代中国城乡家庭研究”、2007 年“城乡家庭调查”、2008 年“中国五城市家庭调查”等。基于上述调查形成的代表性研究文献包括：陈玉光、张泽厚：《论我国人口的家庭结构》，《人口与经济》1983 年第 4 期；五城市家庭研究项目组：《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及资料汇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沈崇麟、杨善华：《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七城市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沈崇麟、杨善华、李东山：《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杨善华、沈崇麟：《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沈崇麟、

或以家庭结构变迁的村庄历史个案数据为依据。<sup>①</sup>从理论视野看,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在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研究中影响甚广,即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都将由传统扩大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该理论的主要假设,尤其是家庭结构变迁的动力和方向,在欧美国家引发了大量的学术争论和批评。<sup>②</sup>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经验研究文献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持不同态度。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家庭结构逐渐趋于核心化、小型化,<sup>③</sup>家庭和婚姻的变迁程度与社会变迁程度基本同步;<sup>④</sup>第二类研究认为我国家庭结构正在走向核心化、小型化,但认为家庭变迁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城市化和工业化,更与改革开放前农业集体化制度剥夺传统大家庭<sup>⑤</sup>生产职能密切相关;<sup>⑥</sup>第三类研究也赞同我国家庭结构的核心化早在集体化时期就已发生这一观点,但其在计算国家人口普查数据后发现,改革开放后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并未进一步增强,直系家庭也未进一步衰落。<sup>⑦</sup>

本文将借助国家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统计年鉴和学术研究文献中的村庄家庭结构变迁数据,以家庭户规模、家庭类型结构、家庭代数结构、家庭人数分布四个指标综合勾勒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家庭结构变迁。笔者赞同第三类研究的观点,对前两类研究持保留态度,认为家庭结构变迁与集体化、城市化、工业化等多重因素有关,改革开放后我国家庭结构既有总体趋于小型化的一面,又有传统家庭形态稳定的一面。与前人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如下特点:(1)增加2010年以后的数据,这一个阶段呈现的趋势与2010年之前略有不同,这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经验与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分殊,也有助于理解我国家庭结构变动中的波动与反复;(2)不同时期家庭结构小型化与核心化趋势并不同步,且影响因素也不太一样,改革开放前家庭类型结构趋于核心化,但在家庭户规模上却大幅波动,改革开放后规模总体小型化,但未有进一步的核化趋势,已有研究并未对其中的差异进行仔细辨析;(3)在资料使用方面,本文主要运用国家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统计年鉴数据,<sup>⑧</sup>这些全国性数据更有说服力,但考虑到土改与集体化时期官方数据相对有限,本文又尽可能地借助研究文献中反映这一时期的

李东山、赵峰:《变迁中的城乡家庭》,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马春华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和王跃生的冀南五村庄调查,参见费孝通:《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费孝通:《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 ② 唐灿详细梳理了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争议,参见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 ③ 核心化指家庭类型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导,且其比例趋于上升;小型化指家庭户规模趋于减少。对核心化与小型化的定义,参见马春华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杨菊华、何绍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人口研究》2014年第2期。
- ④ 这类研究总体赞同家庭现代化理论的相关假设,是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研究中比较主流的观点,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参见马春华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 ⑤ 传统大家庭指涉家庭的结构形态而非功能形态,包含复合家庭、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
- ⑥ 参见王天夫等:《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 ⑦ 参见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王跃生:《当代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比较》,《社会》2006年第3期;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 ⑧ 家庭类型结构的数据主要转引自王跃生对人口普查数据的整理,后文会有进一步介绍。

村庄历史个案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尽可能多角度还原这一时期的家庭结构变迁趋势。

70 年的历史进程将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土改与集体化时期（1949—1978）、改革开放前期（1979—2000）、改革开放深化期（2001—2018）。数据显示，我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小型化趋势；核心化趋势在土改和集体化时期已经发生，在改革开放后这种趋势并没有进一步强化，传统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家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小型化与核心化趋势在不同时期并不一致，土改和集体化时期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并未带来小型化，改革开放后小型化也未伴随进一步的核心化；家庭结构相关指标在 2015 年抽样调查数据中出现反弹，我国的家庭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未以线性方式演进；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政治运动、生活条件、计生政策、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多重因素，是推动家庭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总之，本文在经验上梳理了新中国 70 年家庭结构变迁趋势；在学术上则从家庭结构变迁趋势、变迁动力、小型化与核心化的区分三个层面，重新检视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和我国已有家庭结构变迁研究的相关论述。

一、土改与集体化时期（1949—1978）

除家庭户规模和家庭类型结构外，这一时期的代数结构、人数分布数据均比较缺乏。为了尽可能地从多个角度描绘土改与集体化时期家庭结构的变迁，本文部分借助 1982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或其他 1982 年前的调查数据代替 1978 年这个时间点的情况，通过这些数据与之前不同历史时段的数据对比勾勒变迁趋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规模推广是在 1982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以后的事情，城市体制改革则更晚，对外开放也只是在小范围试行，这几年与集体化时期有较大幅度的延续性，数据替代方案因此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图 1 显示了这一时期我国家庭户规模的变化趋势。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家庭户规模相比 1947 年有大幅度的下降。1947 年家庭户规模为 5.35 人，1953—1978 年间的最高峰也仅为 4.81 人。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各类政治运动，不断削弱传统私有制经济下家庭的农业生产职能和道德伦理，从而动摇联合大家庭存在的基础，导致家庭户规模相比 1949 年以前大幅降低。集体经济制度下，家庭不再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家长权威削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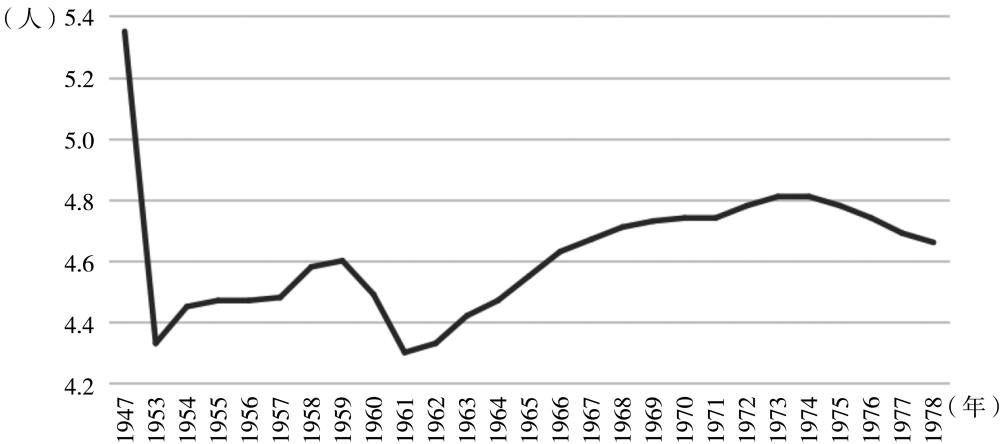


图 1 改革开放前历年家庭户规模

资料来源：1947 年的数据由中华民国内政部人口局统计；1949—1988 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88》。

子女对大家庭的经济依赖降低,有分家倾向;父母为减轻负担、减少家庭矛盾也愿意分家。1958—1960年间的集体食堂制度更进一步冲击了传统大家庭“共灶合餐”的习俗;各类政治运动则进一步冲击了传统道德伦理和家长地位。<sup>①</sup>

从这一时期内部变化趋势看,家庭户规模总体略有上升,1953年为4.33人,1978年达到4.66人。家庭户规模在1953—1959年间总体呈上升之势,其后两年则有较大幅度下降,1962年之后又开始上升,1973年、1974年达到新中国成立后家庭户规模的最高点(4.81人),之后开始下降,1978年降至4.66人。两次规模上升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技术进步、社会安定背景下生育率上升、死亡率下降的结果。1959—1961年间的家庭户规模下降趋势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经济困难、口粮供应紧张、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的直接反映。而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工作,则对控制城乡(尤其是城镇)的生育水平和家庭户规模起到关键作用。<sup>②</sup>

一些村庄历史变迁调查为我们揭示了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类型结构的变化。自1936年在江村进行经典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后,费孝通随后又对江村进行了多次回访,并对家庭类型结构的变迁进行了比较。1936年、1950年、1964年的数据显示,江村核心家庭占总体比例一直上升,分别为23.7%、32.3%、44.7%,直系家庭的比例则相应下降,分别为45.4%、35.5%、20.5%;复合家庭则在江村一直比较少,比例分别为3.3%、4.9%、2.4%。在观念意识上,江村农民将直系家庭作为其主导的家庭类型结构,父母一般会有一个已婚的儿子共同居住。导致直系家庭减少、核心家庭增多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集体化将家庭生产职能剥离到集体;二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江村人口增长导致20世纪60年代核心家庭增加;三是农村副业收入下降、经济困难导致两代之间尤其是婆媳之间关系紧张。<sup>③</sup>

王跃生考察了自1930年以来冀南地区的历史变迁,其调研的五个村庄的家庭类型结构也呈现核心化趋势。王跃生与费孝通对核心家庭的定义有所不同,前者将“夫妇中只有一方健在同子女组成的家庭”归为核心家庭,费孝通则将这种情况归为残缺家庭。冀南五村庄核心家庭比例总体高于江村,残缺家庭则低于江村,部分与统计口径的差异有关。两者在直系家庭、复合家庭方面统计口径比较一致。从数据上看,在1956年以前,冀南五村庄直系家庭比例总体上比江村低;复合家庭相比江村更高一些。不过,传统大家庭逐渐解体、核心家庭比例上升的历史趋势在冀南五村和江村则是一致的。冀南农村家庭类型结构变迁具体表现为:核心家庭占比则逐步上升;复合家庭所占百分比,从土改前、土改(1946)、高级社前夕(1956)到1966年,依次降低,甚至在部分村庄消失;直系家庭占比在1956年及以前一直比较稳定,然而到1966

① 相关论述参见费孝通:《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陈玉光、张泽厚:《论我国人口的家庭结构》,《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4期;马侠:《中国家庭户规模和家庭结构分析》,《人口研究》1984年第3期;邵秦、胡明霞:《中国家庭结构历史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4期;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王天夫等:《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② 参见陈玉光、张泽厚:《论我国人口的家庭结构》,《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4期;马侠:《中国家庭户规模和家庭结构分析》,《人口研究》1984年第3期;林富德:《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分析》,《人口研究》1987年第1期;邵秦、胡明霞:《中国家庭结构历史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4期;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当代中国农村婚姻家庭变动——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

③ 参见费孝通:《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费孝通:《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年,受“四清”运动的影响,在部分村庄有大幅度下降。家庭类型结构的变迁,总体上受到土改、农业集体化和政治运动的影响。1966 年,冀南五村庄的核心家庭占总体比重在 61.2%—71.7%之间,直系家庭在 12.6%—23.7%之间,复合家庭在 0.0%—1.6%之间。王跃生的调研显示了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核心化趋势。<sup>①</sup>

对浙江镇海县中宅村的调研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从 1952 年、1972 年再到 1982 年,该村核心家庭占比依次上升(分别为 59.2%、67.4%、82.8%),直系家庭比重依次下降(分别为 29.0%、24.2%、13.3%),复合家庭则逐渐消失(分别为 10.5%、0.8%、0.0%)。<sup>②</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1983 年组织的“五城市家庭调查”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城市家庭类型结构的变迁。此次调查对调查对象结婚时婆家和娘家的家庭类型结构进行了询问,从相关数据中可知:(1)城市家庭结构有核心化趋势,婆家和娘家的核心家庭比例分别在 1957 年、1953 年后逐步增长,联合家庭均在 1957 年后下降,直系家庭相对比较稳定;(2)核心家庭是这一时期主导家庭类型结构(在 48.94%—69.28%之间),但直系家庭比例也不低(在 16.59%—27.97%之间);联合家庭比例较低,在后期趋于消失;(3)以核心家庭为主导的城市家庭类型结构在解放前就确立了。<sup>③</sup>当然,因为一些新婚家庭在婚后可能不会立即与父母分家,所以这种推算方法可能低估核心家庭的比例,在评估女性婆家的家庭类型结构变化趋势时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 1980—1981 年在江、浙、川、陕等七个地区 1016 户的调查资料也显示,核心家庭比例在 1940 年前后为 30%,1981 年则增至 36%;直系家庭则由 43%增至 55%;复合家庭则由 23%下降至 6%。<sup>④</sup>从 1982 年的普查资料看,该调查低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核心家庭的比例,高估了直系家庭、复合家庭比例。但其显示的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却与这一时期其他城乡调查是一致的。<sup>⑤</sup>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一时期家庭户规模略有增长(见图 1)是在家庭结构核心化的趋势下发生的。如前所述,一方面,土改、集体化、各类政治运动削弱传统大家庭的生产职能和大家族权威;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尽管中间穿插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医疗技术的进步、社会安定,总体上促进了生育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下降,从而导致传统大家庭瓦解与家庭户规模增长并存的趋势。

最后将 1982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与新中国成立前相关数据对比,分析家庭代数结构和人数分布的变化趋势。从家庭代数结构看,1982 年以二代户为主体,一代户、二代户、三代及以上户比例分别为 13.74%、67.45%、18.79%;而 1930 年李景汉的河北定县调查的数据结果则分别为 2.52%、48.93%、48.53%。一代户、二代户比例大量增加,而三代及以上户比例则大幅度减少。从家庭人数分布看,1982 年一人、二人户比例分别为 7.94%、10.06%,相比 1930 年的河北定县调查、1931 年卜凯在 22 省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七地区调查(针对 1930—1940

① 参见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王跃生:《当代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比较》,《社会》2006 年第 3 期。

② 参见邵秦、胡明霞:《中国家庭结构历史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88 年第 4 期。

③ 参见仇立平:《我国城市家庭结构变动及其发展的模型研究》,《人口研究》1987 年第 5 期。

④ 陈玉光、张泽厚:《论我国人口的家庭结构》,《人口与经济》1983 年第 4 期。

⑤ 在 1982 年人口普查中,全国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占总体的比重分别为 68.30%、21.74%、0.92%,与七地区的调查结果有较大差别。参见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2 期。

年的情况)结果,均有明显增加;三人、四人、五人、六人户分别占 16.05%、19.56%、18.35%、13.11%,相比上述三次调查结果,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七人及以上户占 14.90%,相比上述三次调查结果,有明显下降。<sup>①</sup>这两个指标显示的变化趋势,与该时期家庭结构核心化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在土改与集体化时期,家庭户规模相比解放前有大幅度下降。在该时期内部,家庭户规模则呈现“上升—(短暂)下降—上升—下降”的大幅波动趋势,1978 年相比 1953 年甚至略有增长。村庄历史个案和城市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城乡家庭类型结构均呈现出核心化趋势。家庭代数结构相比解放前,更趋向于一代户、二代户,三代及以上户比例减少。从家庭人数分布看,七人及以上户比例,较解放前有明显下降,而一人、二人户比例则相对有明显增加。与解放前相比,家庭类型结构趋于核心化,代数结构则更为简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内部,家庭类型结构核心化、代数减少与家庭户规模略有增长的现象并存。其变迁动力有所不同:1949—1978 年间我国家庭户规模和家庭人数分布的变化,受集体经济制度、生活条件、医疗水平、自然灾害、计划生育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家庭类型结构和代数结构的变化,则是土改、农业集体化和各类政治运动影响下家庭生产职能弱化、家长权威受冲击的结果。

## 二、改革开放前期(1979—2000)

自 1982 年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我国的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更为丰富,且整理汇集成册,部分学者也对 1982 年以后人口普查中有关家庭结构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测算。本文接下来将主要借助官方公布的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统计年鉴数据,以及王跃生等人基于 1982 年以来的普查数据算出的不同家庭类型结构比例,勾勒改革开放后的家庭结构变迁趋势。

上文提到,自 1974 年后,我国家庭户规模开始逐步下降。如图 2 所示,自改革开放至 2000 年,家庭户规模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1979 年的家庭户规模为 4.65 人,1982 年“三普”时降至 4.51 人,1990 年“四普”时降至 3.93 人,2000 年“五普”时进一步降至 3.59 人。导致家庭户规模下降的因素首先是计划生育。1982 年 9 月,计划生育政策被党的十二大定为基本国策,同年 12 月又被写入宪法。1991 年 5 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旨在进一步贯彻执行计生政策,严控人口增长。其次,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国人的生育意愿也在降低。<sup>②</sup>在严厉的计生政策和国人生育意愿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的出生率在这一时期持续降低。<sup>③</sup>第三,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虽然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职能得以部分恢复,但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扩展,却又发挥着削弱传统大家庭的农业生产和收入分配职能的作用,并进一步推动流动人口与农村家庭的居住分离。<sup>④</sup>改革开放后家庭户规模降低,与出生率降低密切相关。而出生率又受制于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年轻人生育观念变化等因素。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下,农村分田到户虽然恢复了家庭部分生产职能,但在这一时期并没

① 参见马侠:《中国家庭户规模和家庭结构分析》,《人口研究》1984 年第 3 期。

② 参见侯佳伟等:《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③ 参见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人口科学》2007 年第 1 期。

④ 参见王天夫等:《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

有导致传统大家庭的复归，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趋势得以保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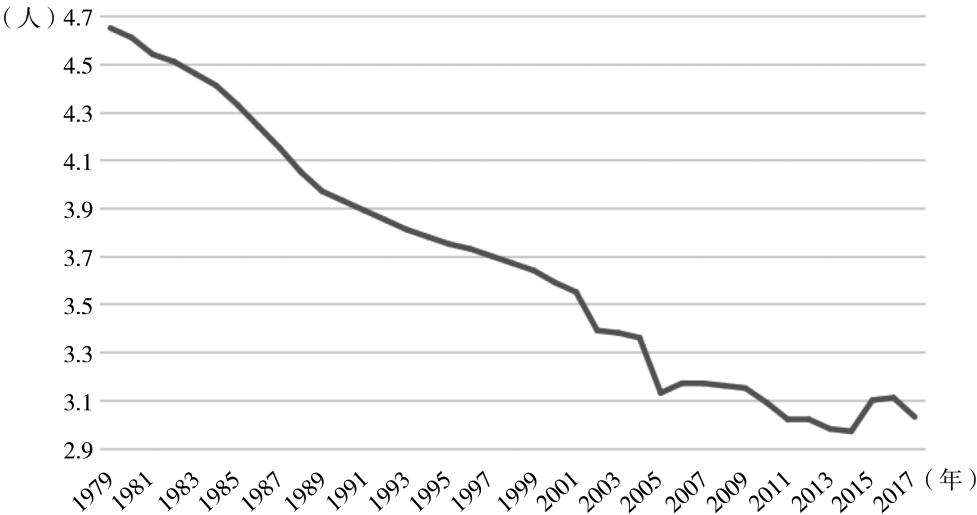


图 2 改革开放后历年家庭户规模

资料来源：1988—2006 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7—2017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家庭类型结构看（见表 1），这一时期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占总体的比例相对比较稳定，单人户在 2000 年略有增长。核心家庭占绝对主导地位（68% 以上），但直系家庭比例也超过 21%。王跃生将核心家庭进一步细分为夫妇核心、标准核心、夫妇分居核心、单亲核心、扩大核心、过渡核心，将直系家庭细分为三代及以上直系、二代直系、隔代家庭。核心家庭方面，2000 年夫妇核心家庭比例相比 1990 年有大幅度提升（分别为 12.93%、6.49%），标准核心家庭则相应降低（分别为 46.75%、53.53%）；夫妇分居核心、单亲核心、扩大核心所占比例较低，且在“三普”、“四普”、“五普”中均逐渐降低。直系家庭方面，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占比一直稳定在 17% 左右，是最主要的直系家庭类型结构；二代直系家庭比例逐渐降低；隔代家庭则由 1990 年的 0.91% 增至 2000 年的 2.11%，增幅明显。<sup>①</sup> 单人户、夫妇核心家庭的生长，标准核心家庭的减少，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民众婚育观念变化、流动人口家庭成员

表 1 改革开放后家庭类型结构 (单位：%)

家庭类型结构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核心家庭	68.30	70.61	68.18	60.89
直系家庭	21.74	21.33	21.72	22.99
复合家庭	0.92	1.08	0.56	0.58
单人户	7.98	6.34	8.57	13.67
残缺家庭	0.84	0.57	0.71	0.93
其他	0.22	0.88	0.26	0.93

资料来源：王跃生根据“三普”、“四普”、“五普”、“六普”数据整理。参见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2 期。

① 家庭类型结构的细分数据参见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2 期。

分离等因素作用的结果，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相符。而直系家庭比例的相对稳定则说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家庭生产职能部分复归，传统家庭形态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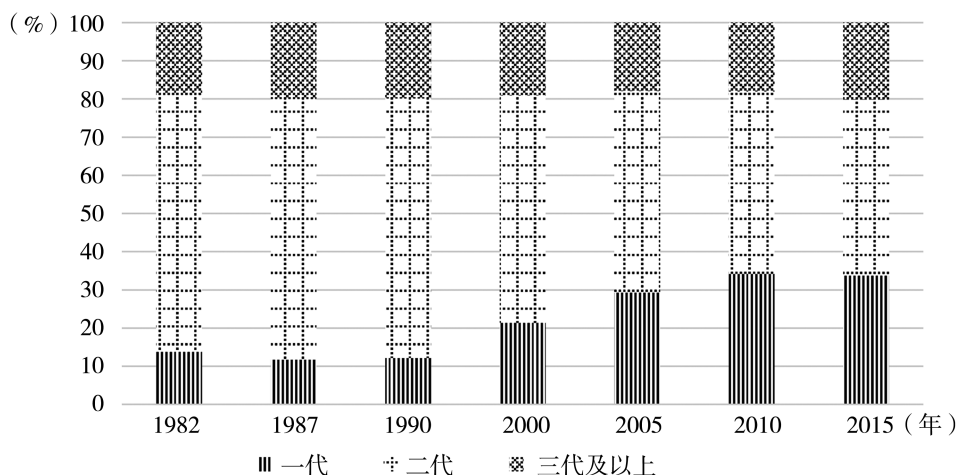


图3 改革开放后家庭代数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及《中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图3显示，家庭的代数结构在1982年、1987年和1990年间未有明显变化。而在1990年和2000年两次普查数据中，家庭代数结构则有较大变化，一代家庭在10年间增长了9.55个百分点，二代、三代及以上户则分别降低了8.74、0.82个百分点。二代户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2000年普查数据中有一定程度的削弱。1990—2000年间家庭代数结构与类型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从家庭人数分布看（图4），1982年、1987年、1990年、1995年，占比最高的是三人、四人、五人户，2000年则变为三人、四人、二人户。从柱形图也可以看出，自1982—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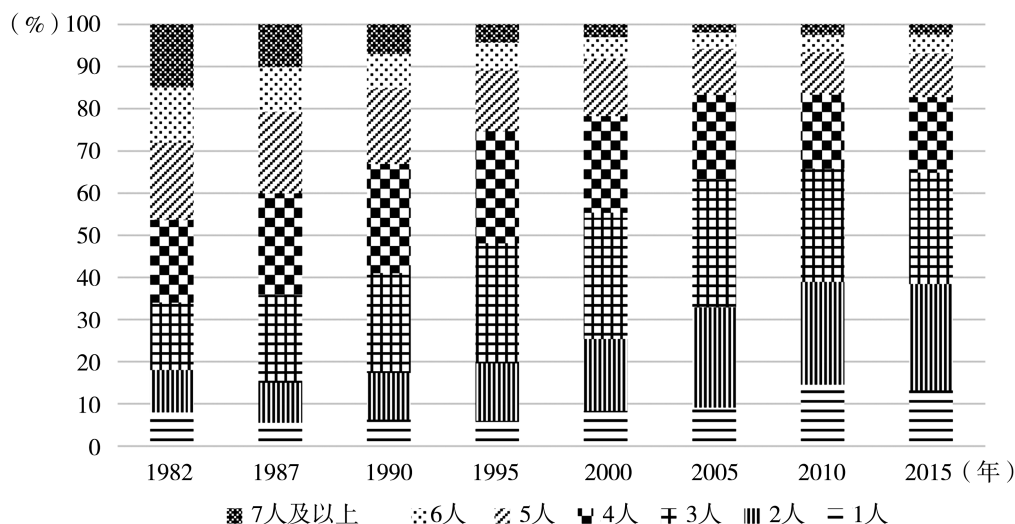


图4 改革开放后家庭人数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以及《中国 1987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作者根据改革开放后四次普查资料算出的“一人户”比例，与王跃生（2013）根据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算出的“单人户”家庭比例，略有差异。

三人及以下户总比例稳步增长，五人及以上户总比例则逐渐下降；四人户比例在 1982—1995 年间逐渐增长，之后开始下降。家庭人数分布的变动，与家庭户规模的变化趋势总体一致。

通过综合分析改革开放后的人口普查、1% 抽样调查、统计年鉴数据以及二手研究文献，本文发现，在 1979—2000 年间，中国的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家庭户规模延续了集体化后期的下降趋势，从 1979 年的 4.65 人下降为 2000 年的 3.59 人。家庭类型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导，单人户、夫妇核心家庭、隔代家庭比例有所增长，标准核心家庭、复合家庭、二代直系家庭比例减少，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比例保持稳定。家庭代数结构则体现为二代家庭为主导、代数结构变少的趋势，一代家庭比例上升，二代家庭比例下降。从家庭人数分布看，三人、四人户的比例相对较高，三人及以下户比例稳步增长，而五人及以上户则逐渐下降。

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推行，有效降低了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家庭的小型化趋势。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扩展带来了人口跨地区流动的浪潮，并进一步带来农村地区空巢、独居和城市非家庭化迁移比例的增长；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则带来民众（尤其城市居民）生育意愿的下降，这些因素进一步推动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则部分恢复了家庭的生产职能，从而为农村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的稳定存在（甚至增长）提供重要土壤。尽管这一时期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明显，但核心化趋势却没有进一步增强。

### 三、改革开放深化期（2001—2019）

进入 21 世纪后，以 2001 年加入 WTO 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持续推进，我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区域间的人口和各类要素流动加快，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

我国这一时期家庭户规模（图 2）总体仍在变小，但 2005 年后总体降幅较小，且存在波动。2001 年家庭户规模为 3.55 人，2005 年降至 3.13 人，2006 年又回升至 3.17 人，在数据上保持了 4 年的稳定后，2010 年又开始下降，2014 年降至 2.97 人，为历史最低，随后又经历升降，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分别为 3.10 人、3.11 人、3.03 人。

家庭户规模整体下降但又在 2005 年以后发生波动，可能是我国经济、社会、人口和制度层面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经济与社会层面看，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众的生活方式不断变迁，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加上城市化带来的生活压力，总和生育率降低，民众对婚育的选择日趋多元化，单人户和夫妇核心家庭比例增长，由此导致家庭户规模降低。<sup>①</sup>但从人口层面看，长期的计生政策导致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子女，这些子女更有可能与父母共同居住生活、组成直系家庭。这是因为当代独生子女在成家之后面临着经济（如城市购房）和抚育子女方面的需求。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抚幼需求的增加，为传统的直系家庭赋予了新的存在土壤；少子化趋

① 参见杨菊华、何焰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人口研究》2014 年第 2 期；胡湛、彭希哲：《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14 年第 3 期。

势下家庭内部兄弟姐妹间的冲突也会减少,分家的动力进一步减弱。<sup>①</sup>直系家庭比例的增加间接推动家庭户规模的增长。人口流动趋势的变化也有可能推动家庭户规模的变化。人口流动固然会带来家庭成员的分离和子女一辈经济上的独立,并带来空巢、独居家庭的增多。<sup>②</sup>但近年来人口流动趋势发生变化。一方面,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地回流至中西部地区和家乡附近发展。2010年的人口普查和2015年的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开始呈现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趋势;2008年以来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占总体比例逐渐减少,中西部地区、本地农民工占比逐渐提升。返乡流动人口无论是在家庭附近发展,还是周边城镇工作购房,他们都更容易与父母、配偶、子女共同生活。另一方面,沿海城市农民工携妻带子、家庭化迁移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流动人口回流家乡和家庭化迁移这两大趋势,共同推动了家庭户规模的增长趋势。最后,随着我国2011年以来“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政策的相继实施,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出生率的下滑趋势,并对家庭户规模产生一定影响。

这一时期的家庭类型结构,只有2010年的“五普”数据,虽然难以反映2010年以后的情况,但将其与2000年的数据进行对比,仍能看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变化趋势(表1)。相比2000年,2010年的核心家庭比例下降7.29个百分点,单人户比例增长了5.10个百分点,直系家庭也增长了1.27个百分点。进一步对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进行细分。数据显示,相比2000年,2010年标准核心家庭下降了13.61个百分点,降至33.14%,其主导地位已大大削弱;夫妇核心家庭则增长了5.53个百分点,增至18.46%;直系家庭中,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的比例在新世纪头10年保持稳定,二代直系和隔代家庭略有增长。<sup>③</sup>单人户、夫妇核心家庭增长,标准核心家庭大幅度降低,反映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民众婚育观念和选择的变化,晚婚、晚育、不婚、丁克等现象日益增多。城市化背景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导致单人户、夫妇核心家庭、隔代家庭的生长。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少子化趋势,又增强了父母与年轻夫妇共同生活的趋势,减少了直系家庭分家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二代直系家庭的生长和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的稳定。

与家庭户规模的波动类似,这一时期家庭代数结构也开始呈现出与前一时期不一样的态势(图3)。2005年、2010年的一代户比例持续增长(分别为29.35%、34.18%),二代户比例持续下降(分别为52.69%、47.83%),三代及以上户的比例则比较稳定(分别为17.96%、17.99%)。家庭代数结构在新世纪前十年呈现的变化趋势,与家庭户规模和家庭类型结构数据是一致的。然而到2015年,家庭代数结构却没有持续之前的趋势,一代户、二代户比例(分别为33.79%、46.02%)相比2010年均略有降低,三代及以上户的比例相应增长了2.21个百分点(20.20%)。

家庭人数分布数据在这一时期也显示了家庭结构变化趋势的反弹(图4)。这一时期,二人、三人、四人户仍然是相对主流的类型结构。相比2000年,2005年三人及以下户总比例增长,四人及以上户总比例下降。之后情况有所变化。2010年、2015年相比2005年调查时点数据,一

① 参见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胡湛、彭希哲:《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② 参见杨菊华、何绍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人口研究》2014年第2期。

③ 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人、二人、六人及以上户比例增长（2015 年一人户比例相比 2010 年有所下降），三人、四人户比例下降。家庭户规模、家庭代数结构与人数分布在 2010 年后的变化趋势共同说明，传统大家庭有重新焕发生机之势，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未必会进一步发展。如前所述，这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推行数十年的计生政策造就大批独生子女，这一人群在成家之后面临着经济（如城市购房）和抚育子女方面的强烈需求，传统直系家庭的生产职能虽然削弱，但收入分配和劳务互助的职能被重新激发；二是流动人口返乡或举家迁往沿海大城市，一定程度上推动家庭户规模增长。

21 世纪初，我国的家庭结构总体仍在保持小型化趋势，但这种趋势在 2010 年后似乎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传统直系家庭有重新焕发生机的势头。家庭户规模总体在降低，但 2005 年后存在一些波动，2015 年家庭户规模甚至比 2014 年增加 0.13 人。在 2010 年的家庭类型结构数据中，既有单人户、夫妇核心家庭比例增长的一面，也有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比例保持稳定的一面。从家庭代数结构看，一代户比例呈现出先升后略降的趋势，二代户比例持续下降，三代及以上户则先降后升。从家庭人数分布看，2010 年、2015 年相比 2005 年调查时点数据，一人、二人、六人及以上户比例增长，三人、四人户比例下降。与家庭户的波动趋势相对应，2015 年，一人户、一代户比例有所下降，三代及以上户比例增长明显。

这一时期两个趋势值得注意：（1）家庭户规模总体下降与家庭核心化程度降低可谓一体两面，人口流动使得空巢、独居现象大量增加，现代社会民众婚育观念变化，导致单人户、夫妇核心家庭比例增加，标准核心家庭比例大幅度下降，家庭户规模也随之下降；（2）2015 年家庭户规模、代数结构、人数分布的反弹，说明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并不必然导致家庭结构的线性变化，传统直系家庭反倒成为民众应对城市化困境的宝贵资源，这与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预言的趋势恰恰相反。

## 结 论

总体上，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的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尽管在改革开放前家庭户规模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但这一时期相比解放前（1947 年，5.35 人）仍有下降。1973 年、1974 年家庭户规模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顶峰（4.81 人），随后一路低走，在 2005 年后经历一定波动后，最终在 2017 年降至 3.03 人。在家庭人数分布方面，土改和集体化时期，一人、二人户比例相比解放前有明显增加，七人及以上户比例相应降低。改革开放后至 2005 年，一人、二人户比例继续增长，三人、四人、五人户先增后降，六人及以上户比例逐渐下降。与家庭户规模 2005 年后的波动类似，2010 年，六人及以上户比例略有增长；2015 年，一人户比例有所下降。

家庭类型结构并没有呈现与小型化相应的核心化趋势。相比家庭户规模大幅度波动之势，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家庭类型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为核心家庭比例提高，复合、直系家庭比例降低。改革开放后，家庭户规模大幅度下降，但核心家庭（尤其是标准核心家庭）比例却没有增长，且在 2000 年后大幅下降，与之相应的是直系家庭比例长期稳定，单人户比例在 2000 年后增幅较大。家庭代数结构也呈现类似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一代户、二代户比例相比解放前有较大幅度增长，三代及以上户比例则相应有较大程度降低。改革开放后，一代户比例总体趋于增长，二代户比例总体趋于下降，三代及以上户比例相对稳定。2015 年的情况有所不同，三代及以上户比例增长，一代户比例略有下降，这与家庭户规模、人数分布的变化趋势相呼应。

表 2 推动家庭结构变迁的因素、作用机制、效果、时段

影响因素	作用机制	影响效果（基于数据分析） <sup>①</sup>	主要影响时段
土改	剥夺富裕家庭的土地与生产资料，削弱家庭生产职能	复合家庭比例降低，核心家庭比例增长	1949—1955 年
集体化	农业集体化削弱家庭生产职能和财富分配能力	复合、直系家庭和三代及以上户比例降低，核心家庭和一代户、二代户比例增长	1956—1981 年
政治运动	“四清”与“文革”冲击传统道德伦理与家长权威	复合家庭比例降低，核心家庭比例增长	1963—1976 年
生活条件	物质、医疗条件改善，生育率上升，死亡率下降	家庭户规模增长	1949—1958 年， 1962—1982 年
自然灾害	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上升	家庭户规模下降	1959—1961 年
计生政策	政策推行致生育率下降	家庭户规模下降	1975—2010 年
	政策放宽致生育率部分回升	减缓家庭户规模下降趋势	2011—2019 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部分恢复家庭生产职能	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比例稳定	1982—2019 年
城市化与工业化	大规模人口流动致家庭成员分离，生活方式变迁、教育程度提高致婚育观念变化	家庭户规模下降，单人户、夫妇核心家庭、隔代家庭、一代户比例上升，标准核心家庭、二代户比例下降	1992—2019 年 <sup>②</sup>
	直系家庭应对城市化抚幼、购房等困境，更多流动人口回流家乡或城市家庭化迁移	家庭户规模波动，三代及以上户比例上升	2009—2019 年

表 2 分析了相关因素对家庭变迁的作用机制、影响效果及产生影响的主要时段。生活条件的改善一度促成家庭户规模的增长；然而计生政策的推行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降低了家庭户规模。土改、集体化、政治运动是家庭核心化的重要驱动力；城市化、工业化进一步推动单人户、夫妇核心家庭、一代户比例的上升，以及标准核心家庭、二代户比例和家庭户规模的减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传统大家庭在改革开放后有稳定的生存土壤；而在城市化、工业化深度推进后，年轻夫妇在购房与抚幼等方面的困境、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的需求、计生政策的放宽，又重新推动了传统大家庭比例的增长，并导致家庭户规模的波动。

总体而言，我国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与家庭结构小型化并存的，是传统大家庭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对稳定。进入 21 世纪后，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三代及以上户、六人及以上户比例增长的现象。与我国已有的家庭结构变迁研究相比，并对照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本文发现：（1）新

① 由于家庭人数分布涉及数据较多，且同样的家庭人数（如四人户）可能由多种家庭类型结构和代数结构构成，此处不讨论相关因素对家庭人数分布的影响。

②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化进程迅速推进。从统计数据看，我国 1990 年的流动人口规模仅为 2135 万人，1995 年迅速增至 7073 万人，可参见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2013 年第 2 期。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家庭结构总体呈小型化趋势,但在改革开放后,核心化趋势并没有进一步强化,传统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这与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预言的趋势有所不同,与王跃生、杨菊华等人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sup>①</sup>(2) 家庭结构变迁的动力不仅来源于城市化、工业化,也与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政治运动、生活与医疗水平改善、计划生育、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修正了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对家庭结构变迁动力的分析,与王跃生、王天夫等人的观点一致;<sup>②</sup>(3) 不同时期家庭结构小型化与核心化趋势不太一致,土改和集体化时期家庭类型结构核心化但家庭户规模略有增长(且内部大幅度波动),改革开放初期家庭户规模持续下降但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并未增强,进入新世纪后家庭户规模总体进一步下降但核心家庭比例也在下降,推动不同时期家庭结构小型化与核心化的动力机制也有所不同,家庭现代化理论和我国的经验研究均未对此进行仔细区分;(4) 家庭户规模、代数结构、人数分布在 201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反弹,与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预言的趋势、国内相关研究对改革开放后家庭变动方向的判断不尽相同,说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深度推进,我国的家庭结构未必以线性化的方式演进,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抚幼需求、购房压力、流动人口家庭团聚需求,很大程度上依然需要依靠传统大家庭来化解。

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下我国民众婚育观念和选择的多元化似乎在撼动传统大家庭和标准核心家庭存在的基础,但年轻夫妇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抚幼、购房、家庭团聚需求又可能将祖孙三代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两股力量的同时推动下,我国未来家庭结构是否呈现现代小家庭(单人户和夫妇核心家庭、一代户、一人和二人户)和传统大家庭(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户、六人及以上户)比例同时增长的趋势?还是如 2015 年抽样调查数据预示的那样,传统大家庭比例继续增长,小家庭比例难以增长?家庭户规模是否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不断波动?未来家庭结构的变迁方向值得关注,但这需要从更新后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寻找答案。

〔责任编辑:李文珍〕

① 参见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2 期;杨菊华、何绍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人口研究》2014 年第 2 期。

② 参见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王天夫等:《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

distinguishing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earlier than Western philosopher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as “the major fundamental problem of all of philosophy” is a scientific summary of the universal character of philosophy as a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It is an unavoidable basic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e Thought of Art beyond Art History: Jean Baudrillard as an Opponent and His View on the End of Art** Li Xianyou • 101 •

“The End of Art” was a topic that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debate on this topic generated a set of new ideas and new understandings of contemporary thinkers. Baudrillard stands opposite mainstream Western art historians, estheticians, and critics. From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of art-things, he completely dismantled the history of ideas behind the concept of “art” and deconstructed the intrinsic metaphysical logic of the topic through the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produced by art. In the re-identification of value, we were led to an anti-essentialist thinking of art. Throughout Baudrillard’s half-century of academic life, we find that the end of art in his description is a theoretical performance and a comprehensive clearing of the art history tradition.

**Chinese Sociology: From Localization Attempts to Subjective Construction—Discussion of Ten Changjiang Scholars in Sociology** Li Wenzhen • 110 •

**Miniaturization or Nucleation?: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New China** Wang Jianhua • 118 •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hinese family structure has tended to be miniaturized in general. However,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trend of nucleation has not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traditional lineal family and households with three generations and more still have a plac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are not only from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factors such as land reform,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political movement, living conditions, birth control, and the rural joint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Comparing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on family with the research articles on the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in China, we can find that the trend of miniaturization and nucleation is inconsistent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The nucleation of family structure in the period of land reform and collectivization did not give rise to miniaturization, the miniaturization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not been accompanied by further nucleation, and relevant indicators rebounded in the 2015 sample survey data. The family structure did not evolve linearly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Evaluation of New Journals: Challenges and Exploration** Geng Haiying • 131 •

The evaluation of new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the scope of evaluation object, the difficulty of the disciplinary classification of journals, and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 in traditional journal evaluation methods. I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evaluation of new journals,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are adopted: targeting and clarifying the purpose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of journals; defining the scope of the evaluation object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time and content; developing a disciplina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new journals; choosing applicable indicators according to new journals’ characteristics; and designing an AMI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Of course, the evaluation of new journals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and the data collection process, improvement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disciplina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journ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still have room for improvement.